读史札记

图像中的郭实猎

李骛哲

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①]是近代中西交通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于1826年来到东南亚，开始了自己的传教生涯。在鸦片战争之前，他曾数次冒险缘中国沿海航行，进行传教和贸易的尝试；他是义律、郭富、璞鼎查的中文秘书，参与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多数中英交涉；他是“汉会”的建立者，为基督教中国本土化之嚆矢。作为19世纪上半叶中西方“交流”的重要人物，他的著述和经历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

除了相关档案文献，这位经历复杂、极富争议的历史人物还留下不少图像资料。其中，仅他个人的画像就有十余幅之多。这些画像分布于郭氏东来以后的各个时期，弥足珍贵却鲜为学界所重视。郭实猎到底给世人留下过怎样的印象？与他同时代的西方人又如何看待他？本文将通过这些肖像画与相关文献的比较，展现郭氏形象在西方的变迁史，并且探讨造成郭氏形象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一、1830年代的探险家和中国通

郭实猎最早的画像是一幅速写，现藏于美国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图1）[②]图中，郭实猎身着中式服装，背景是潦草的中式帆船和位于山巅的宝塔。这幅草图的作者是19世纪旅居澳门的名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按照当时油画市场的惯例，在正式绘制油画之前，画师都会向买家提供草稿，作征求意见之用。这幅画也不例外，在图像右上方就能找到几行速记符，表明此图的买家是林赛（Hugh Lindsay，1802—1881），绘制的时间则是1832年9月27日。[③]

郭实猎与林赛相识于1832年初。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计划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号往中国北方沿海进行贸易考察，林赛是此行的负责人，郭实猎则是商船上唯一的翻译。

“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历时半年，渐次停靠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港口，9月5日返

[收稿日期] 2019-09-20
[作者简介] 李骛哲（1986—），男，德国图宾根大学（Universität Tübingen）亚洲与东方学院博士后；wuzhe.li@philosophie.uni-tuebingen.de

① Gützlaff的中文名有郭士立、郭实腊等多种写法，但他本人使用的中文名则一直是郭实猎，参见李骛哲：《郭实猎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② 该图编号：1832_M976541_Gutzlaff_pem

③ 陈继春曾经提到过钱纳利的这些速记符，却误以为是在“石版画”上。但该画仅是钱纳利的速写，明显不是印刷品。参见陈继春：《钱纳利与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79页。

图 1　钱纳利速写的郭实猎像

回澳门，除销售了随船携带的部分货物外，还对沿海地区的物价、人口、驻军、水文等情况作了较为深入的调查，震动清廷朝野，影响甚巨。在航行中，郭、林二人需共同应付沿途的清政府官员，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友谊。① 这幅由林赛出资的画作，似乎正是在描绘郭氏随"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时的情景。

在速写中，有两个细节很值得注意。一是远景处位于山巅的宝塔，其山形走势和宝塔的形制皆与厦门湾内的南太武延寿塔类似。② 郭氏自称是福建厦门人，③ 钱纳利很可能是在利用这座厦门湾内的航标来表示郭实猎的身份。更重要的一点是郭氏的头部。图中浅色头巾包裹的头顶部分，明显多出一撮黑色的头发，似乎表明郭氏在年轻时不但常穿华人服饰，甚至很可能模仿过华人的发型。汉服、蓄发、留辫的情况，在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中都有过先例，但在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中，长期坚持穿着汉人服饰的，似仅有郭氏一人。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所穿的服饰多为士大夫的常服或官服，郭实猎穿着的则是低层水手的服饰，可见二者接触华人阶层的差异与传教路径的不同。

这幅油画曾于 1835 年送往英国皇家协会展出，惜已亡佚。如今行世的版画依据油画原作制成。④ 初版长 31.3 厘米，宽 24.7 厘米，印制的时间也在 1835 年。其核心元素与草图并无二致，可能由于构图的缘故，删去了手稿中的宝塔，但仍旧保持了郭实猎的探险家形象。在图像下方，没有注明郭实猎身份的任何文字，但印有原作者钱纳利和版画作者 Richard James Lane（1800—1872）的名字。Lane 是维多利亚时代非常著名的版画艺术家。这幅郭实猎的画像，同样反映了他高超的艺术水准。在初版之后，该画被大量复制，广泛地刊登在各种媒体之上，并有多个不同尺寸的版本行世，遂成为郭氏最负盛名的一幅画像。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的初版上没有注明郭实猎是传教士，而是更多地强调他作为探险家的业绩。

郭实猎的肖像之所以会制成版画发行，和他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有直接关系。1831 年上半年，他的妻女先后在曼谷病逝。⑥6 月 18 日，带着一种悲愤交加的情绪，郭实猎搭乘中国商船，只身北上，并最终到达天津。在外商只能蜗居广州、澳门的时代，这一壮举使郭实猎在人生的

---

① 这次航行除在郭实猎所撰的航行记中有详细记录外，在《清实录》中也颇多记载。详见李骛哲：《郭实猎与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见《郭实猎与开放中国》，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94-123 页。

② 太武山与厦门岛五姥峰隔海对峙，山上建有石塔，名延寿塔，过往船舶，望以为航标。该塔建于宋代，1958 年拆除，今仅存塔基和石额坊。

③ 爱汉者纂：《赎罪之道传》，道光甲午年刻本，第 6 叶。

④ 该版画初版收藏于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文献编号：D21841。

⑤ 较为有名的一个复制版，现收藏在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的"Miscellaneous Autograph Collection"中，整幅图长 19.2 厘米，宽 11.5 厘米，约一张 7 寸相片大小。其下方注有三行英文题记，依次是："Revd. Chas. Gutzlaff""Missionary to China""in the Dress of a Fokien Sailor"，译为"郭实猎牧师，来华传教士，身着福建水手服饰"。在巴色会档案中还收藏有一个长 14 厘米，宽 8.3 厘米的版本，但下方没有印刷文字。此外，这幅画至少还曾被刊登在 1845 年 3 月 1 日的《画报》（*Illustrirten Zeitung*）上。参见 Miscellaneous Autograph Collection /279: Gu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1803-1851）,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1 autograph letter（1836）, 1 portrait, 2 other engravings；*Illustrirten Zeitung* zu Leipzig（Ausgabe vom 1. März 1845, Band IV, Nummer 87）；BMA，QS-30.021.0046. 巴色会档案馆将该图命名为："*The missionary Gützlaff disguised as a sailor from Tokien Province*"，其中 Tokien 当为 Fokien 之误。

⑥ Alexander Wy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58.

最低谷暴得大名。1832 年 2 月 10 日，马礼逊将郭实猎推荐给东印度公司，并在写给伦敦会秘书 W.A.Hankey 的信中这样描述了他的近况：

> 他（郭实猎）的冒险行为与勇于说话使他在此间颇受赞扬，搭乘中国船只向北航行之举塑造他成为胆大之人与当今宠儿。①

郭实猎瞬间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焦点和明星。除了见诸报端的大量报道外，他的游记也迅速成为了书商们追捧的目标。1832 年 5 月，刚刚开始发行的《中国丛报》连载了郭氏最初的航行记。② 次年，《中国沿海两次航行记》③ 在纽约出版。又过一年，《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④ 在伦敦发行，随后陆续出版的至少还有上述游记的两个荷兰语译本和一个德语译本，并且不断再版。林赛在这个时候展出和发行郭实猎的画像，自然是正当其时。

另一方面，这幅版画的政治背景也非常值得关注。在郭实猎之前的新教传教士中，钱纳利仅为马礼逊画过像。Lane 也早因一幅维多利亚女王十岁时的画像而名满伦敦了。林赛是典型的英国商人，他能请得两位名家出手作画，背后自然饶有深意。

1833 年，在“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结束之后不久，林赛即回到英国。作为詹姆斯 · 马地臣的侄子、“伦敦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协会”的重要成员，他在回国之后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游说政府对华开战。⑤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 1834 至 1835 年间，林赛至少做了三件事：首先，在伦敦出版他与郭实猎合著的《“阿美士德勋爵”号在中国北方沿海的航行报告》；⑥ 然后，将郭实猎身着福建水手服饰的油画画像送往皇家协会展览，并且制成版画发行；紧接着，向身为外相的巴麦尊提出了那封著名的《与巴麦尊子爵论英华关系书》，⑦ 清晰地勾勒出了四年之后鸦片战争的蓝图。

林赛的这些动作，暗含着一条简单却极其重要的逻辑，他想要告诉巴麦尊和英国政府：第一，中国蕴含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第二，郭实猎的探险证明了这些利益唾手可得；第三，实现这些利益的方法仅是一场小小的战争。而且他“深深地相信，就在整个作战期间……还可以做很大的生意。”⑧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此高调地宣传郭实猎进入中国探险的形象，自然是在为对华开战的言论造势。

这幅《身着福建水手服饰的郭实猎》影响极大。1835 年以前，郭实猎最重要的事业并非传教，而是冲击中国沿海的封锁。这也是印在他身上最耀眼的“商标”。图中郭实猎身着中国服饰，站立于沿海地区，还有悬挂十字架的中国商船，这些元素本身就象征着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中国的强烈诉求和希望。所谓时势造英雄，郭实猎由此成为了这个时代来华西人的代表，他的名字乃至于形象也与“中国的开放”结下了不解之缘。1838 年，郭实猎的“中国总论”出版，书名冠以“*China Opened*”（《开放的中国》）。⑨2008 年，美国学者鲁珍晞出版了一本广受学

---

① 转引自苏精：《上帝的人马》，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 年，第 36 页。

② 这次连载从 1832 年 5 月的创刊号开始，直到 9 月的第五期方才结束。参见 *The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 Macao & Hong Kong, vols. 1-20, 1832-1851.

③ Charles Gutzlaff, *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1831, &1832*, John P. Haven, 1833.

④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1833*,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1834. 该书当年就印刷了第二版。

⑤ 林赛于 1841 年，鸦片战争期间，代表保守党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此次当选显然与他长期主张对华开战的立场有直接关系。

⑥ Lindsay & C. Gutzlaff,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B. Fellowes, 1834.

⑦ H. Hamilton Lindsay,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Saunders and Otley, 1836.

⑧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pp.14-17.

⑨ 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1838, 2vols.

界关注的郭氏传记，不但将书名定为“*Opening China*”[①]，而且还把这张郭氏画像印上了封面。

奇怪的是，在1850年以前，从未出现过郭氏主动使用上述画像示人的记录。郭实猎仿佛不愿意人们记住他的中式扮相。他公开使用的肖像，都是一副西装革履的样子。比如郭实猎赠与友人的纪念品，就是一幅他身着西式礼服的黑白半身剪影。在剪影的下方，除了郭实猎亲笔书写的中文名外，还有两行荷兰语签名“Charles Gutzlaff”、“Chineesch Secretaris”。[②] 而在1834年纽约版《中国简史》的扉页上，印制的也是一幅郭实猎身着同类礼服的半身像。[③] 图下附有郭氏的亲笔题签：“Your obedient Servant”、“Ch. Gutzlaff”。肖像的右下角注有该图的作者Stephen Gimber（1810-1842），此人是以雕刻和肖像画著称的英国艺术家，但具体的绘制时间不详。西装革履的肖像可以反映出郭实猎作为商务监督中文秘书的职业，也代表了他对自己公众形象的定位。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和郭实猎的思想变化有关。在经历过“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之后，郭实猎看清了清政府大员们的腐败和庸懦，英国政府和鸦片商的雇佣则使他找到了“开放”中国的捷径。1830年代中叶，是郭实猎思想上重要的转折期。他将自己的笔名“爱汉者”改为“善德者”，放弃了原先对中华文化一味追捧的态度，[④] 开始大量发表抨击中国的言论。

1834年，郭实猎在《中国简史》纽约一版的序言中，清晰地表述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

> 由贸易开路，中国于欧洲国家正日渐成为一个饶有兴味、引人探寻的主题。贸易促进了中华文明艺术的升华，展现了这一国度坐拥的资源，也让我们对中国人的品性与智性培养有了新的认识。迄今为止，由于中国去英道远，加之其对异邦人政策粗鲁淡漠，二者合一导致信息片面、喜好夸大的旅行者带来的错误印象挥之不去。鼓吹专制权力的人刻意宣传关于中国莫须有的观念，其中之一就是统领这个巨大帝国的政府可被视作专制统治的完美模型，其遭遇的革命和内战远远少于西方的自由国家；其军事实力惊人，融合了数个时代的智慧，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派出的武力和施行的政策足以将其颠覆。然而，希望读者通过精研此二卷，可将如上想法尽数驱散；笔者遍访中外各类人士，他们会就中国自身历史和对外交往两方面提供一个比之大众皆知的部分更准确、更全面的视野。英商从今往后可自由使用中国港口，这一事实将扫平至今将中国庞大人口与世界其他国家割裂开来的那些阻碍；最好的结果有望到来，而大英帝国编年史上的新纪元将即刻开启：中国跻身世界文明开化的基督教国家高贵行列的那一日已近在眼前。[⑤]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共同经历过“阿美士德勋爵”号航行的郭实猎和林赛确实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强硬、对抗、战争是他们共同的主张。野心勃勃的郭实猎要“尽数驱散”西方的“中国热”，将中国扫下神坛，还要为殖民主义者和鸦片商张目，“扫平”将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那些阻碍”、开启“大英帝国编年史上的新纪元”。序文的重点在贸易上，无论是逻辑还是立场，都与林赛如出一辙。郭氏身为传教士，却表现得更像是商人或探险家，全文仅在最末处述及“基督教”，不免使人疑心他是否忘记了自己的本职。

作为“世界文明开化的”“高贵”代表，郭实猎的目标是充当引导中国“进步与开化”的“导师”，他不可能再“委身屈就”去做“两大文明的使者”，更不可能成为身着汉服融入中国的“遣唐使”。郭实猎的那身中国的行头，是他潜入中国境内的必要装备，却决不能代表他对中国的情感和立场。这也就不难理解，当郭实猎在欧洲声名鹊起之时，和他互动最密切的竟是英国

---

① 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 1827-1852*,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② 该剪影在香港海事博物馆、莱顿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

③ Charles Gu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Jonh P. Haven, 1834.

④ 参见李骛哲:《郭实猎姓名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⑤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pp.v-vi.

政府和鸦片商人，而那些传教差会却时常遣不动他。[①]

二、英国官方出版物中的翻译与“汉奸”

自 1834 年起，郭实猎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此后，他的工作重心转向对华交涉。鸦片战争爆发时，郭实猎任英军的第二翻译，参与谈判，负责安抚难民、搜集情报等工作。

在这一时期，为了配合鸦片战争的宣传，英国一些拥有官方背景的出版机构印刷了大量战争题材的版画作品。在这些宣传版画中，我们也能找到郭实猎的身影。比如在那幅由女王御用书商 Moon 出版的《<南京条约>签订图》（*The Signing and Sealing of the Treaty of Nankinginthe State Cabin of H.M.S. Cornwallis, 29th August 1842*）上，[②] 就有郭实猎的身影。在图中，他立于图像后排中轴线右侧第一处，穿的是一身西式礼服。在郭实猎的左右两侧分别坐着耆英和牛鉴，他身体略显右倾，仿佛正在低头为耆、牛二人做口译。

在此类描绘鸦片战争的版画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威尔斯利”号上的谈判》（图 2）。这幅版画的内容是 1840 年 7 月 4 日英军在定海城下劝降清方官员的情景，由亲历其事的达雷尔准将（Sir Harry Darell Bart）绘制，J. H. Lynch 制版，于 1842 年 1 月，由科尔那杰帕克公司（Messrs. Colnaghi&Pucker）在伦敦公开发售。[③] 根据在版画上标注的出版信息，该公司是英国女王的专用出版商。

图 2 “威尔斯利”号上的谈判

在这幅版画的周围，印有细密的说明文字。通过这些说明可知，坐于图片正中者即为郭实猎，在他左侧就坐的三位英军军官，自左向右分别是达雷尔、伯勒尔（Brigadier Burrell）和伯麦（Sir J. J. Gordon Bremer）；立于后方的是“威尔斯利”号（Wellesley）舰长梅特兰（Captn. Maitland）和使团军事秘书乔斯林（Lord Jocelyn）。坐在右侧的三名中国官员则是张朝发（图注为“中国海军上将”）、某军官（“他的旗舰舰长”）、姚怀祥（“舟山的地方长官”）。作画的达雷尔是这场交涉的亲历者，郭实猎又谙熟中国沿海地方形势，所以画中标注的人物应是较为准确的。

关于这场著名交涉的中方参与者是谁，一直存在争议。中国学者多认为登上英舰的只有姚怀祥，而英文文献中则多称前去谈判的是“总兵”，即张朝发。近来，有中国学者依据英文的记述，倾向认为只有张朝发登上了英舰。[④] 但是从这幅图来看，张、姚两人应该均在交涉现场。

---

①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27 页。

② Londen：published april 20. 1846. By F.G.Moon. Printseller in ordinary to Her Majesty & H.R.H. Prince Albert. 20. Threadneedle street. 该图由英军中校普拉特（Lieut.-Col. Pratt）在签约现场绘制，并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John Burnet 制成版画，于 1846 年 4 月 20 日，在伦敦公开发行。

③ 该幅版画至少还有两个德文的翻版，质量较好的一幅，图案与英文版完全相同，但着色水平较差；另一幅则明显是仿制品，图案的质量粗糙，且没有着色。两个德文版本都没有注明图中的人物，仅载有译为德语的图片说明。原文如下：Zusammenkunft zwischen dem englischen Commodore Bremer und Chang. dem chinesischen Gouverneur von Tschusan, auf dem Schiffe Wellesley am 4. Juli 1841. Im Hafen zu Tschusan.

④ 鸦片战争博物馆主办：《明清海防研究论丛》第 2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 2008 年，第 163 页。

文献与图像之所以会有出入，与现场人员的身份有一定关系。英文文献只记主谈的总兵，证明身为知县（正七品）的姚怀祥在张朝发（正二品）和他手下的游击（从三品）或都司（正四品）面前根本没有说话的份。而中文文献多出于姚怀祥手下的文官，其中扬姚抑张的现象较为明显，反映的其实是当地官员的人际关系问题，未必能够全信。

张、姚二人面前的酒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据王庆庄《定海被陷纪略》载，谈判时"帅（伯麦）斟玻璃杯中碧色酒饷，先主而后宾，徧饮及从者"①，正与图像相合。根据西方人的习惯，这种圆锥形的小酒杯，多用于饮用度数较高的雪莉酒。谈判时用烈酒待客，有点儿给对手压惊的意思。细看人物的神色，也确实如此。左侧的清方人员，大多眉头紧锁、忧惧不安；相比之下，达雷尔不但把自己画得英气十足，左侧的英军代表也是个个泰然自若。最关键的当然是身着礼服坐于正中的郭实猎，他此时正手执文件与张朝发等人对话，温和又安宁，显示出一副调停其间的中立者形象。

把郭实猎这位外国神父描绘成随军的中立者，再借中立者的言行来烘托英军的形象，是英国政府对鸦片战争进行政治宣传时的常用手法。这幅画像之外，更多类似的例子来自战后官方组织出版的英军"作战记"。比如洛赫的《在华作战记》中，就有一段文字描述郭实猎进入定海时的情景：

> 进城（定海）后，发现城几乎空了。留下来的极少数人对入侵者的宽恕似乎有点不相信。不过，随军神父兼翻译郭实猎先生的说教很快消除了他们的恐惧感。他在全城张贴散发公告，说明英国人到这里来并不想加害于这里的居民……②

作为随军牧师出场，又能善待当地的百姓，郭实猎无形间就化解了英军的侵略色彩。可事实上，他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却十分关键。郭实猎本就是郭富参谋团的一员，③攻城略地、建言献策从来都少不了他。这位"传教士"参与战争的深度，甚至远远高于普通的英军军官。不过，郭实猎也非常乐意享受这种身份的伪装。传教士直接参与战争并不光彩，无论是郭实猎的同僚抑或他本人，都试图淡化他在战争中的作用。他在战时的通信中，总会不断地强调"自己对战争没有兴趣"。④

郭实猎当然不是中立者，中国人也不会把他看作是中立者。在1949年以后，多数中文的研究著作都会将他斥为"间谍"。但在"威尔斯利"号的谈判现场，郭实猎还被清人冠以一个更常用的头衔——"汉奸"。

这个"汉奸"的头衔，还要从一则流言说起。定海城破之后不久，御史贾臻便向道光皇帝报告了这样一则传闻：

> 闻福建已革举人陈姓，绰号"不得已"……早经逆夷重资聘往，为之主谋，一切文字皆出其手。与总兵张朝发同乡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数日，有投张朝发一帖，导之从逆。⑤

在定海开战之前，英方仅有郭实猎携乔斯林上岛交涉过一次。所谓"投张朝发一帖，导之从逆"，自然是指郭实猎这次递交最后通牒，并邀张、姚二人上舰谈判的事。但几经辗转，早已传得面目全非。接到奏疏之后，道光皇帝郑重其事地给闽浙总督邓廷桢、钦差大臣伊里布分别下发了"查拿陈姓汉奸"的上谕，要求"即派员查拿务获，解交浙江讯究，毋稍疏纵"。⑥

---

①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0-241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6-557页。

③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p.58.

④ ANZ,1102-1.1.2.2.7.1.3.804. No.22, *Karl Gützlaff aan B. Ledeboer*, Nanking den 25 Augustus 1842.

⑤ 贾臻：《追究已革陈姓举人诱导张朝发从逆缘由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8页。

⑥《著毋庸往浙并著查拿陈姓汉奸事上谕》，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宁波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

伊里布和邓廷桢当然抓不到什么“陈姓汉奸”。可这么一闹，又牵上乌尔恭额参张朝发“愎谏撤守”[①]的事，终于“冤”得这位总兵官在战死之后连抚恤都没有拿到。这也只能怪张朝发倒霉。在当时的沿海地区，把郭实猎看做“汉奸”似乎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比如奕经就曾在奏折里咒骂过：“汉奸郭士立”，“可恨已极”。[②]

郭实猎似乎是英军译员里最常被当做“汉奸”的一个。从语言的角度考虑，张朝发是福建惠安人，郭实猎最娴熟的方言正好是闽语。传言说他是“张朝发同乡夙好”，证明郭实猎的口语的确足以乱真。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郭实猎的外貌和装束。

英军军医克里（Cree）曾在日记里描述过郭实猎初到定海时的装扮：

> 他虽然是个普鲁士人，但看起来更像是中国佬……对汉语和中国人都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当他戴着假辫子、穿着中国的衣服化装潜入中国时，没有人能够发现他。他现在穿着一件陈旧的黑外衣，南京紫花布裤子很短，样子有些古怪。[③]

克里是老资格的军医，在军中地位不低。从1839年开始，他便在亚洲海域的战舰上服务，参与过1841至1846年间不少重要的中英交涉活动，并且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文字记录和现场绘画。这批文献属于私人记录，并非服务于读者或者政治的出版物，其内容反而更加可信，也更能反映现实的场景。从这则日记来看，除了“化装潜入中国”的特殊情况之外，郭实猎一般都穿西式服装。但是这段文字的意思稍微有些含糊，一是很难判断郭实猎在平时到底戴不戴“假辫子”；再者文中的“古怪”二字也颇值得注意。

图3　耆英与海军上将（右立者为郭实猎）[④]

好在克里还画过一幅郭实猎的画像（图3），正好是他参与清英交涉时候的场景。这幅插图名为《耆英与海军上将》（*Keying and the Admiral*），画的是1845年11月耆英访问香港时的事情。时任英国海军驻“东印度与中国区”（East Indies and China Station）司令的柯克伦（Sir Thomas John Cochrane）与之拥抱告别，郭实猎立于其右，显然是在作翻译。图中的“老郭”（old Gutzlaff）[⑤]依旧穿着他那件“陈旧的黑外衣”与“很短”的南京裤，和克里五年前记录的形象丝毫不差。这令人联想起1818年7月5日，巴黎《淑女与时尚》（*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杂志上刊登的一幅时装彩图，“有天鹅绒领子和丝绸纽扣的服装、南京裤子”（Habit à Collet de Velours et Boutons de Soie. Pantalon de Nankin），[⑥]图上男子的衣着与郭实猎的极其相似。原来，郭实猎平日的装束，正是曾在欧洲风靡一时的着装风格。

至于克里所说的“古怪”，在图中也能看得十分清楚。除去那身西式的衣裤，郭实猎脑后的头发一直延伸到后背上，直到被肩膀挡住，一条“假辫子”隐约可见，还有他脚下的圆头布鞋也明显是“中国货”。作为一种工作需要，郭实猎很可能会在他接触中国人的场合，都拿出那根“假辫子”。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拉近自己与中国人的距离。即使在重要的外交场合，郭实猎

①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94页。

②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22页。

③ Edward Hodges Cree, *Naval Surgeon*, Dutton Adult,1982, p.61.

④ *Naval Surgeon*, p.177.

⑤ *Naval Surgeon*, p.174.

⑥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1818.7.5. 该图是“巴黎时装”（Costume Parisien）系列中的一幅，编号1743。

也会穿得不中不洋、不伦不类。他至少没有一直保持在《<南京条约>签订图》和《“威尔斯利”号上的谈判》画中的那种西装革履的绅士形象。

不伦不类的中西混搭恐怕是郭实猎刻意为之，这样的着装虽然不符合外交场合的礼仪要求，却很能突出他“沟通中西”的特殊能力。在外语人才奇缺的年代，其实没有西方人会在意他到底穿着什么衣服。但当郭实猎穿着这身行头、戴上假辫子，操着流利的闽南语，出现在交涉过程中时，十有八九都会被中国人当成“汉奸”。

三、1850 年前后的传教士形象

郭实猎的本职是传教，但在他 1850 年以前的图像资料中，却很少出现与宗教题材有关的形象。这一现象和当时沿海的态势有关。鸦片战争以前，西人很难进入内地，因为基督教在中国被禁止传播，传教士也不敢在中国公开宣道。待鸦片战争结束，基督教传教士被允许进入中国开放口岸，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后期，随着汉会的兴起，郭实猎在传教事业上的业绩才逐渐显现出来。

民国著名外交家王宠惠的祖父王元琛是汉会的早期成员。他曾在《圣道东来考》中记述了郭实猎建立汉会的情况：

> 郭士立教士居香港，为英人翻译官，兼招人学耶稣道，日间办理公事，朝晚教授耶稣道理。其初学道者不满十人，渐招渐众，皆自备斧资而来。稍明达者，郭君即遣之入内地传道，派送耶稣圣经，为将来教士入内地传道之先路。郭君立教会时，名其会曰福汉会，意欲汉人明道得福也。[1]

郭实猎是鸦片战争期间第一个深入中国的传教士。多年来积累的资历，使他的影响力远超其他来华传教士。在此时的西方世界，新教的传教活动早成风潮，狂热的信徒不少，只等合适的对象出现，捐款人便会蜂拥而至。在郭实猎的极力宣传下，大量西方传道组织和个人的捐款，纷纷涌入汉会的账户。相比之下，哪怕颇负盛名的伦敦会、美部会都要逊色不少。

1849 年 4 月，郭实猎的妻子病逝。10 月 1 日，他乘船返回欧洲度假。[2] 其间，郭氏在西方不断地进行宣传和演讲，马克思、恩格斯、[3] 戴德生（James HudsonTaylor）[4] 等人都来旁听并深受影响。

当郭实猎途经荷兰时，曾经拍过一张相片，印制在《中华帝国史》（*Gützlaff's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1852 年版的荷兰语译本的扉页上。[5] 这张相片大约拍摄于 1850 年 4 月，[6] 其中，郭实猎一身正装，衣着与他在《<南京条约>签订图》中的形象完全一致，但面容却比十六年前收在《中国简史》中的画像苍老了许多。传说郭实猎 1851 年去世的诱因，是他患有严重的痛风

---

① 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 年，第 180 页。从现有档案来看，该组织一般自称为“汉会”，而非“福汉会”，本文亦沿用“汉会”之名。

② Karl Gützlaff, *Dr. Karl Gützlaff's Bericht seiner Reise von China nach England und durch die verschiedenen Länder*,Verlag und Druck der Erpredition der Chinesischen Stiftung, 1851, p.2.（郭实猎：《从中国到英国的旅行报告》）

③ 参见陈力丹：《郭士立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新闻界》1999 年第 1 期。

④ 戴德生在 1865 年创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就曾借鉴“汉会”的经验。他曾说：“郭实猎乃中国内地会之祖。”参见 Herman Schlyter, *Karl Gü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Håkan ohlssons boktryckeri, 1946, p.301.

⑤ Karl Gützlaff, *Gützlaff' s geschiedenis van het chinesche rijk van de oudste tijden tot op den vrede van Nanking*, K. Fuhri, 1852.（郭实猎：《中华帝国史》荷兰语版）

⑥ 相片下端有一行小字及郭实猎签名，经笔者仔细辨认，小字的内容为：F. B. Waanders 制版，C. W. Mieling 石印。此二人均为荷兰籍。由此可知这张相片是 1850 年 4 月前后，郭实猎于荷兰宣道期间拍摄的。

或水肿。相片中郭氏肥胖的体型，似乎证明此时郭氏的身体确实存在隐患。

除这张相片外，在巴色会（Basel Mission）的档案中，还藏有一幅郭实猎版画大像（图4）。这幅版画的尺寸比较大，长31厘米，宽21厘米，由柏林的Waldow发行，但作者及发行时间不详。画中，郭实猎身着牧师袍服，面部特征与相片一致，可知该图与相片为同一时期作品。事隔15年，郭实猎的大幅画像再次出现在欧洲，标志着他与汉会的影响力均已达到顶峰。

图4 身着牧师袍服的郭实猎[①]

然而盛极必衰，对于汉会的种种质疑也随之兴起。美部会的卫三畏、裨治文，伦敦会的理雅各、麦都思，甚至汉会自己的传教士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都对汉会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谴责郭实猎“弄虚作假”，[②]指责汉会的成员骗取川资，倒卖传教书籍，吸食鸦片。[③]

1850年2月，理雅各、韩山明等人在香港组织委员会调查汉会。4月，这份用以揭露汉会的“真实与虚假、善与恶”[④]的调查报告开始在欧洲流传。报告的冲击力毋庸置疑，在欧洲不少传道会的档案馆中，我们都能找到这份调查报告，有的差会甚至直接将这份报告夹在郭实猎的相关资料甚至是亲笔信当中。郭实猎一度试图辩解和反击，但收效甚微。他在传教界的形象轰然垮塌，再难重塑。1851年8月9日，郭实猎在香港突然病逝，汉会也随之衰落，不久便烟消云散了。

皂白难分、真假莫辨，是汉会的致命伤，也是郭实猎身败名裂的原因。不过，在传教的问题上，郭实猎似乎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恶名昭彰。至少在克里的眼中，郭实猎就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恶人。在他的日记里绘有一幅郭实猎在舟山办学时的画像。[⑤]图下有文字说明“Miss Parkes”“Mr. Gutzlaff”“and their Chinese class”，并标明该画作于1840年12月7日。图中的Miss Parkes是郭实猎的外甥女，巴夏礼的亲姐姐。在她和郭实猎身后站着的，就是他们的“中国班”学生，约有十六七人之多，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在亚洲传教期间，郭实猎每到一地，只要停留的时间略长些，他总会开办相应的慈善机构和学校。在来到舟山之前，Miss Parkes就曾在郭实猎创办于澳门的学校里担任英文老师，而容闳正是她在该校的学生。[⑥]在舟山开班办学的郭实猎依旧穿着那身中西混搭的服装，既没有福建水手的马褂，也没有笔挺的西装。

平心而论，郭实猎为传教和慈善事业做过大量的工作。汉会的丑闻只是郭实猎传教活动的一个部分。中国的国情复杂，向内地传教殊为不易。对于他在早期新教入华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学界的研究还相当不够。至于汉会所暴露的问题，在传教士大规模入华、信徒数量徒增、教案频发的19世纪下半叶或许已显平常，但在口岸刚刚开放的四十年代，却绝非信仰坚定的传教士们所能接受。郭实猎的失败，究竟是他的人品与人格的必然结果？抑或是他超前的思维与行动所带来的失败？仍需大量历史事实的佐证方能做出判断。

---

① BMA，QS-30.017.0005

② 参见 Theodore Hamberg, *Report regarding the Chinese Union at Hongkong*, Hongkong Register Office, 1851.

③ 转引自苏精：《上帝的人马》，第59页。

④ 汉会2月23日会议纪要，载《汉会调查备忘录》。

⑤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Collection，*Private illustrated Journal of Dr E H Cree*, Volume III, 1839（CRJ/3）.

⑥ 参见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值得注意的是，汉会的丑闻和郭实猎的猝死，都没有冷却西方公众对于他的关注。在 1850 年到 1852 年间，郭实猎的荷兰语的《在我的荷兰基督徒兄弟中间》[①]（1850）、荷兰语和德语的《在华传教》[②]（1851）、德语的《东亚地区的贸易条件》[③]（1851）、英语和德译的《道光皇帝传》[④]（1852）等著作先后在欧洲出版。在得知郭实猎病逝之后，还有荷兰人撰写和出版了名为《关于郭实猎，在他的送葬曲响起之际》[⑤] 的纪念文章。

1851 年，普鲁士的传教组织"普鲁士国家基督教宣教著作总会"（Haupt-Vereinfür christliche Erbauungs-Schriften in den Preußlichen Staaten）出版《郭实猎传》。对郭实猎在华传教的历程大加赞许，在这部传记的封面上，就印有那幅在传教界颇有影响的郭氏画像。[⑥]

郭实猎是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公众可接触到的媒体上，有关郭实猎的负面报道数量较少。无论是郭氏本人的游记、宗教刊物上的书信和报道，抑或其他的相关信息，无不将他塑造成中国的开拓者和基督教世界的英雄。即便是在汉会丑闻爆发之后，对他的指责或攻击持续的时间也不长，而且很快就被 30 年代以来的大量正面报道所淹没，以至于难觅踪影了。在社会舆论中，对于郭实猎的普遍认知多是正面的、积极的。直到 20 世纪初，在西方普通大众的心目中，郭实猎依旧是一个传奇的探险家和伟大的开拓者。只有同时代的传教士，才会通过差会内部的媒体或渠道，讨论他的过失，并宣泄不满。那些抨击他的报道和言论，尽管刺耳且发人深省，却多躺在传道会的档案室，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随着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才重见天日。

毕竟，对于传教事业而言，丑闻毫无裨益，因此宗教媒体并不会大肆宣扬传教界的丑闻。郭实猎肖像的变迁史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现象，从没有图像讽刺或者指责过他的言行和丑闻。

四、小结

也许是因为郭实猎太过活跃的缘故，他在近代史上的每一种身份或事工，都能找到对应的图像资料。这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来华西人中，是极其罕见的。郭实猎的画像，见证了他的年龄变化，记录了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事业成就，也反映了西方公众在各个时期对于他的直观印象。

这些直观印象，构成了郭实猎的形象变迁史，也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东方世界的认知和诉求的变迁史。这些图片的绘制和发行，大多有明确的目的和倾向，图中人物的形象和服饰自然会受到有意识的筛选和修饰。舆论的制造者，甚至会选择性地遗忘掉郭实猎的某些身份甚至经历，比如英军的雇员，或者丑闻的主角。只有私人日记里的两幅画像才能向我们展示出郭实猎在正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形象。时代的焦点、社会的热忱、政治的利益、宗教的狂热和个人的情感都是造成这类现象的重要因素。而这类图像资料所造成的错觉，又常被人们本身固有的成见所利用，直到今日也未能全然消散。

---

① Karl Gützlaff, *Aan mijne mede-christenen in Nederland*, Loman Jr, 1850.（郭实猎：《在我的荷兰基督徒兄弟中间》荷兰语版）

② Karl Gützlaff, *Die Mission in China*, Schulz, 1850. 这两本书并非译本，郭实猎在荷兰和柏林分别做过同名的演讲，上述两书分别整理自对应的演讲记录。

③ Karl Gützlaff, *Ueber die Handelsverhältnisse im östlichen Asien*, Schultze, 1850.

④ Karl Gü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Smith, Elder and Company, 1852；Karl Gützlaff, *Leben des Kaisers Taokuang*, C.B. Lorck, 1852.

⑤ Petrus Hofstede de Groot, *Over Gützlaff, bij de treurmare van zijnendood*, Oomkens, 1852.

⑥ *Karl Gützlaff's Leben und Heimgang*, Berlin:Haupt-Verein für christliche Erbauungs Schriften in den Preußlichen Staaten, 1851.（佚名：《郭实猎传》）